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畧

第十一輯

传记丛刊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畧

第十一輯

陈翔华 毛华轩 编
权儒学 金根先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传记丛刊）

第11辑

陈翔华 毛华轩 编
权儒学 全根先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海丰印刷厂排版 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插图22幅 10.875印张 270千字

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4000册

ISBN 7-5013-0694-X

K·72 定价：6.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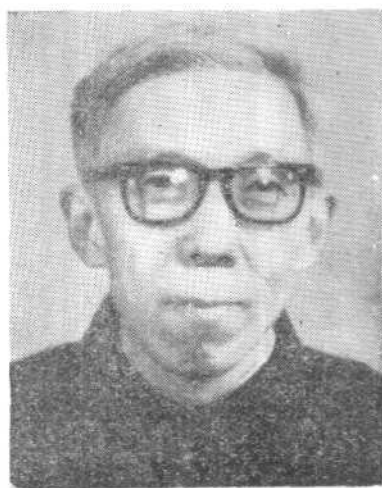
王仲葦 教授



馮沅君 教授



孫楮第 研究員



張永言 教授



张怡荪 教授



陈寅恪 教授



陈鹤琴 教授



余冠英 研究员



余嘉锡 教授



卓炯 研究员



史学家 范文澜



古文献学家 周绍良



周祖谟 教授



季羨林 教授



经济学家祝世康



姚莫中 教授



徐仲年 教授



徐中舒 教授



陆侃如 教授



殷体扬 教授



梁国东 教授



董辅初 研究员

前 言

1949年以来,我国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专家们继续辛勤耕耘,在各自领域内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些学者的治学经历与成就,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一套大型学术传记丛刊。

我们编辑这套大型丛刊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科学各领域内有所建树的专家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积累丰富的学术史料,为各学科与其学术史研究、文科教学以及图书馆情报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同时,传播这些学者的治学精神、方法与经验,以作为渴求步入社会科学殿堂的青年学子的借鉴,并为其他广大读者提供可以启迪智思的有益读物。

为此,我们从1980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从事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而具有显著成就的当代学者传略。学科范围为:文学(还包括艺术学),历史(还包括考古学),哲学(还包括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经济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学,法学(还包括社会学、民族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以及图书馆学等有关学科。传略的内容,包括学者的生平、治学经验和学术上的成就等等,并附尽可能详细的著作目录。我们热诚地欢迎专家学者撰写自传,并欢迎为已故的当代著名专家撰写传略。惠稿请赐寄《文献》杂志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文津街七号北京图书馆分馆内,邮政编码:100802)。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学术民主,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事业服务。

惠稿文责自负。我们按来稿先后分辑出版，每辑按传主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我们的征稿、编辑工作，得到了各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得到有关领导机关和学术部门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在这里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校对工作中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12月

E123/08

目 录

王仲萃	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	(1)
	附：著作要目	(16)
冯沅君	冯沅君传	严蓉仙 (17)
	附：古典文学论著系年	(28)
孙楷第	孙楷第传略	杨 镰 (34)
	附：著作要目	(44)
张永言	张永言传略	田懋勤 (45)
	附：著述目录	(62)
张怡荪	藏学专家张怡荪生平事略	黄显铭 (64)
	附：著作目录	(76)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传	蒋天枢 (78)
	附：编著目录	(93)
陈鹤琴	陈鹤琴传略	陈秀云 陈一飞 (99)
	附：主要著作目录	(107)
余冠英	余冠英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	韦凤娟 (109)
	附：主要著作目录	(121)
余嘉锡	余嘉锡先生传略	余淑宜 (122)
	附：著作目录	(130)
卓 炯	卓炯传略	杨昌俊 黄绍汪 (132)
	附：主要论著目录	(147)
范文澜	范文澜传略	徐曰彪 朱瑞熙 (151)
	附：论著要目	(169)

周绍良	周绍良先生的生平和著作	白化文 (176)
	附: 主要著作目录	(186)
周祖谟	往事自述	(187)
	附: 主要著作目录	(204)
季羨林	季羨林自传	(205)
	附: 主要译著目录	(218)
祝世康	经济学家祝世康	秦柳方 (223)
	附: 部分论著目录	(231)
姚奠中	姚奠中传略	(233)
	附: 论著要目	(241)
徐仲年	徐仲年教授传略	徐大燮 (245)
	附: 部分著译目录	(255)
徐中舒	徐中舒传略	何 靖 (260)
	附: 论著要目	(279)
陆侃如	陆侃如传	牟世金 龚克昌 唐子恒 (285)
	附: 论著目录	(297)
殷体扬	殷体扬自传	(301)
	附: 部分著作目录	(319)
梁园东	梁园东传	丁 仲 (324)
	附: 编著目录	(331)
董辅弼	董辅弼自传	薛永应整理 (334)
	附: 主要编著目录	(339)

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

王 仲 莘

我生于1913年，原籍是浙江余姚县人，从小生长在上海。在上海读小学、中学、大学。

我祖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父亲由我姑父的帮助，从余姚到上海经营商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了财，为了振兴实业，他把全部财产，投资火柴厂等行业。1928年至1930年，世界经济总危机，他破产了。家庭生活大大地衰落了下來。

我十八岁就和第一个妻子余凤年结了婚，当时我还没有大学毕业。我爱好文史，余凤年也爱好文史，她有肺病，经常躺在床上，我们就合作注一部诗集，这就是几年前才出版的《西昆酬唱集注》。那时我在学校听课，刚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很喜爱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要学他们的诗，首先要多记典故，山阴任董叔先生教导我们拣择一部和温李流派相近、使用典故多而卷数却又较少的诗集来加以注释，我就选中了这部二卷本的《西昆酬唱集》来加以笺注。我白天去听课，凤年因病辍学在家，替我检好《佩文韵府》中有关《西昆酬唱集》所涉及到的典故，如此二载有余，集腋成裘，我晚间倚着她的床边，在灯下慢慢梳理。单靠《佩文韵府》是不行的，我就得一部一部书翻检诗句的出处，如《毛诗》、《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麟台故事》、《初学记》、《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穆天子传》、《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庄子》、《列子》、《楚辞》王逸注、《玉台

新咏》、《樊南诗文集》冯浩注、《文选》李善注、《全唐诗》等，一天一天的翻检，翻检得很详细，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最后，还有四五条典故找不到娘家，隔了十多年，偶然在《山海经》郭璞注里都找到了。这一部注，积压箱底有四十年之久，到了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予以出版。

余凤年刚同我结婚的时候，看到我出身公子哥儿，上海又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常常怕我堕落，后来看到我能沉下心来读书，她很高兴，给我以鼓励，给我以力量。可惜她到二十三岁，以二期肺病，怀孕发高烧而死了。从此我过着独身生活，到我三十八岁，才第二次结婚。

我十八岁结婚后，因为我爱人的父亲是章太炎先生日本时期的学生，我爱人的长兄还娶了章夫人汤国梨先生的妹妹的女儿，两家来往密切。我开始和章先生有了接触，但并不密切。到了1930年，我家破产，住房被查封，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拍卖，因此我们搬了家，从上海南市搬到上海英租界同孚路（今石门路）同福里十六号。说也凑巧，章太炎先生当时住在同福里八号，不久又迁到十号。两家成了邻居。

后来我的爱人死了母亲，感伤非常，汤国梨先生和我岳母关系也很好，于是每遇我去校上课，她就找我爱人去她家，多方安慰她，我也渐渐和她接近了。我爱人死后，她知道我喜欢古典文学，就把我的诗文介绍给太炎先生看，先生看了，认为孺子可教。汤国梨先生就推荐我做他老人家的小学生了。我本来是他学生的女婿——小门生一辈，现在成了他的学生了。

我开始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先生自著的《国故论衡》、《文始》。我开始陪侍他去苏州和无锡讲学。当时有人非议他主张读经，我开始也认为读经无用。渐渐听了几次以后，发觉章先生的主张读经，和当时保守

势力的提倡读经在内容上显有距离。第一，章先生继承了浙东学派“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讲经学就是提倡史学；第二，认为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鉴，“保国性”，也就是发扬爱国主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严夷夏之防，劝人不要当汉奸。他的早年学生钱玄同当时复旧名钱夏，他非常称赞改得好，显示了爱国主义精神。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进的。他有纯学术的著作，也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从这一点看，也就懂得章先生为什么这样向往顾亭林，亭林既有《音学五书》这样纯学术性著作，但也有供国家民族可以借鉴的象《日知录》这样的著作，双轨并进，是并行不悖的。

1934年秋，章先生迁居苏州，1935年9月，《制言》第一期创刊号出版。我参加了《制言》一、二、三期的编辑工作，当时主持其事者为海宁孙鹰若先生，参加编辑工作者有潘景郑先生，郑梨邨先生和我共四人。第四期以后，我就不参加了，因为我家当时还住在上海，我还在上海正风文学院听课，父亲一定要我取得大学文凭，正风文学院不是一个教育设备很好的学校，我当时要转学其它大学也很容易，但正风文学院院长王西神知道我的一切学术活动，他对我说：“你就在我们学校吧！你在校外的学术活动，我一定给你支持，你要请假我一定准，我还准备留你在学校工作呢！”这样，我就读到了毕业。

1936年夏，太炎先生以鼻衄病和胆囊炎在苏州逝世。当时我父亲在余姚养病，我在左右侍候他的病，接到电报，赶紧赴苏。章先生的遗著目录，就是在那时我和沈延国兄记录出来发表在《制言》之上的。

七七战争爆发，上海也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我因为父亲在余姚，又在1937年秋天由沪经杭，返回余姚。1938年夏，父亲在余姚病逝，不久，我也离开余姚，到达上海。父亲未死之前，有人推荐我去做小学校长，我父亲不同意我干这个工作，他倒不

是轻视小学校长，而是认为战争既起，农村正在经历着剧烈变化，他认为我应付不了变化，叫我快回到上海去。他还告诫我不要做秘书这类工作，认为这是“绍兴师爷”，做不得。我家设置一亩田，有一所大房子，正面是三上三下，侧面是五间平屋，附带一个不大不小的天井。我这时藏书已有五六千卷，也尽够我翻阅了。当时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读书以待河清。但现实教育我，我必须离开，到我适宜工作的地方去，我就伤心地离开余姚了。我住的那所房子，前面三上三下，在父亲1930年破产时，抵押给人的，大概抵押一万多两银两，在敌伪时代，由伪法院判决，准许拆屋抵债，于是就把这所房子拆了，侧屋五间，我的家属也把它拆了卖掉了，我的五六千卷书，也风流云散了。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我回到余姚改葬父亲和爱妻，他们的灵柩，都是暂厝在村后的，我选择了一块高燥的山地把他们埋掉，我也到了一次我住过房子的废基，在废基上凭吊一番，从此再没有回过余姚。

我现在要回过头来讲讲我的研究工作进行情况了。开始我想编一部《两晋会要》和《南北朝会要》。后来听说泰兴朱铭盘先生已经编成《两晋会要》和《南北朝会要》，避免重床叠屋，我就辍笔不编这些了。因此编了一部《北周职官志》。在章先生健在时，我向他汇报过这一工作，他点点头，指示了两点，一，必须对孙诒让氏的《周礼正义》，仔细地研读，我照他的话做了。二，他说必须广泛参考金石墓志，我听了他的话，后来在1948年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翻阅所藏的金石拓片，后来又翻阅了赵万里氏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都是根据他生前指示来做的。这部书凡四易稿，后来改名为《北周六典》，到1967年才重新写定，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初稿都是在二十多岁时起草的。1935年，又起草了一部《北周地理志》，这是与《北周职官志》密切有关系的姐妹作，主要依据的材料，除正